

世界法学汉译名著

战后 西欧四大国外交

(英、法、西德、意大利)

1945年——1980年

周琪 王国明 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

（英、法、西德、意大利）

1945年——1980年

周 琪 王国明 主 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第165号

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

(英、法、西德、意大利)

1945年—1980年

周琪 王国明 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木樨地南里 邮编100038)

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40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357—7/D·298

印数：2000册

定价：9.50元

目 录

前 言	(1)
-----	-------

英 国

第一章 三环外交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

(1945—1956年)	(11)
外交政策传统和大国梦	(12)
英美“特殊关系”与欧洲大陆政策	(19)
置身欧洲联合之外	(28)
英帝国的解体与非殖民化政策	(33)
第二章 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开端 (1956—1967年)	(42)
苏伊士事件及其影响	(45)
非殖民化政策的全面推行	(52)
英美关系与防务政策	(57)
加入欧共体的前两次申请	(64)
第三章 外交政策重大调整的完成 (1968—1979年)	(73)
海外义务的大规模收缩	(74)
英联邦——印度洋政治的衰弱	(81)
英美“自然关系”与“大西洋联盟”	(88)
加入欧洲共同体	(96)
第四章 重振大国地位 (1979—1986年)	(105)
冷战与缓和的预告者	(106)

英国和欧共体矛盾的解决·····	(115)
英阿马岛冲突·····	(120)
南非问题与英联邦危机·····	(126)

法 国

第五章 第四共和国：难以走出外交困境

(1944—1958年)·····	(135)
分裂的政治和外交政策·····	(136)
大西洋主义与西方联盟·····	(140)
舒曼计划与法德和解·····	(150)
超国家主义和西欧联合·····	(156)
殖民政策及其代价·····	(162)

第六章 戴高乐年代：追求法兰西的伟大

(1958—1969年)·····	(170)
第五共和国与总统个人外交·····	(171)
非殖民化和合作政策·····	(176)
独立政策与大西洋联盟·····	(184)
“多祖国的欧洲”·····	(190)
“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	(200)

第七章 蓬皮杜和德斯坦年代：修正戴高乐主义

(1969—1981年)·····	(207)
修补法美关系·····	(208)
继续与苏联缓和和合作·····	(215)
致力共同体的完善和扩大·····	(220)
倡导南北对话·····	(228)

第八章 密特朗第一任期：另一种政策？

(1981—1988年)·····	(233)
-------------------	-------

新大西洋色彩	(234)
对缓和的矛盾心理	(240)
对西欧联合的新热情	(246)
新第三世界政策的限度	(254)

联 邦 德 国

第九章 军事占领状态的结束 (1945—1949年)	(263)
东、西德分裂的完成	(263)
经济桎梏的放松	(269)
对萨尔的安排	(272)
第十章 重新武装与恢复主权 (1949—1955年)	(274)
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基点	(275)
重新武装	(277)
萨尔重返德国	(282)
重新统一政策的失败	(285)
西德外交政策目标的现实性	(289)
第十一章 困难的抉择 (1955—1969年)	(294)
“戴高乐主义”与“大西洋主义”	(295)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失败	(301)
对戴高乐否决的默认	(308)
哈尔斯坦主义与重新统一政策	(313)
第二次柏林危机	(319)
第十二章 “新东方政策”和经济大国	
(1969—1982年)	(327)
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及其政治态度	(328)
“新东方政策”	(332)
德美之间的摩擦	(341)

欧洲共同体的“出纳员”	(346)
南北关系中的重要角色	(349)
第十三章 变幻局势下的外交局限 (1982—1988年)	(356)
外交政策领域里的争论	(357)
核裁军谈判中的忧虑	(362)
德法合作——大西洋联盟欧洲支柱的基石	(367)
“战略防御倡议”和“尤里卡计划”	(373)
东西德关系的新突破	(378)

意 大 利

第十四章 意大利恢复主权的进程 (1943—1947年)	(389)
共和政府的建立	(389)
对意和约的签署	(393)
战后意大利国家同梵蒂冈的关系	(400)
接受马歇尔计划	(403)
第十五章 缺乏独立性的外交 (1948年—70年代初)	(408)
意大利的政治特点及其与外交的联系	(408)
加入西方体系	(415)
实现欧洲统一的理想与步骤	(420)
意南、意奥领土争端的解决	(429)
第十六章 真正外交的形成 (70年代中—1987年)	(437)
意大利政治的变化	(438)
“小型东方政策”	(445)
热情而欠负责任的共同体成员	(451)
安全与防务方面的努力	(455)
通向地中海和平与合作的桥梁	(461)
在呼吁“国际新秩序”中的获益	(468)
后 记	(477)

前 言

本书的写作重点不是西欧的国际关系，而是分析西欧四大国的外交。因此它注重的不是对事件过程和当事各方的活动的叙述，而是注重挖掘对象国的对外决策动机、决策条件、决策的可行性及效果。正因为此，它不强调西欧各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共性，而是强调它们的个性；即分析的立足点是它们的本国利益，是探讨它们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如何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各国外交技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因而也展现出各国历届政府调整外交政策过程中的连续性。至于各国外交的共性，本书在行文中虽有提及，但主要是希望通过对西欧各国外交的分析 and 对比，使读者自己从中去领略。

本书的另一个写作方法是遵循时间顺序，事件的自然发展过程。它不是离开具体的外交事件来抽象地讨论各国外交的内容、动机和环境，而是通过对事件的阐述来动态地展示这一切。本书的标题“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中的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外交行为，二是外交政策。前者是活动，后者是指导思想。作者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论述，但要做到恰如其分并非易事。事件叙述过繁，会给人以史为主之感，从而违背了本书的初衷；评论过多，又会破坏对事件叙述的完整性，从而使人失去对形成外交政策的背景的了解。

本书并非面面俱到地讨论所有方面的外交关系和罗列历年所有的外交事件，它只对那些构成各国外交重要方面的、在国内外产生相当影响的外交事件和行为感兴趣。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本书作者是基于对下述问题的基本认识来进行写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国外交是在一个发生了物换星移式的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展开的。经过战争的洗劫，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衰落了。欧洲不再是全球的权力中心，从前的世界强国都已沦为二等国家。从战争中崛起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很快开始主演了一场影响战后世界面貌的冷战，导致了一个东西方分裂的两极体系，世界局势也变为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所左右。

国际环境制约了西欧各国的外交。尽管英、法、西德（偶尔也有意大利）仍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它们有关的国际事件在一个时期内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舆论中心，但即使在这一类事件中，它们也不能不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成绩和行为的制约。这些“中等水平的强国必须使它们的外交政策适应于主要不是由它们自己造成而且它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加以控制的环境”。^①

除了意大利之外，我们所讲述的另外三个国家英、法、西德所属的战前德国都曾是世界强国。它们都不甘心屈居于美国麾下，都曾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重温昔日的大国荣耀。英国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法国始自戴高乐的“恢复法国的伟大”、西德战后尽速恢复国家主权和坚持不懈的重新统一政策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恢复大国地位的梦想，因而也是力图打破雅尔塔体系，改变世界格局的行动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政治体系，既是欧洲国家衰落的结果，也是妨碍它们实现梦想的绊脚石（这也是为什么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景会极大地动摇原被视为“经久不衰”的雅尔塔体系）。但是，这些西欧国家的努力在长时期内未能奏效，于是欧洲联合的意识在外交决策者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尽管采取实际行动的时间有先后，步伐也有前进和倒退。

我们特别强调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各国外交必然受到各种

①（英）W. F. 汉里德、G. P. 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页。

因素的制约，包括一国的经济实力、国民的倾向性、各党派力量的消长、政府的政党基础以及政府同议会的权力关系等等。因此外交政策的形成决不是超凡领袖个人意志的结果。但领袖人物审时度势，善于利用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会，却能为一国的外交打开局面，因此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就会在一定的时期、在不同程度上显出领袖人物的独特个性。二战期间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如丘吉尔、戴高乐，以及战后在西德长期执政的阿登纳，都曾在外交决策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他们所制定的外交政策也都成为此后本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的后继者却缺乏他们这样的优越条件，因此以后各个时期西欧外交政策的领袖个性化就成了偶然的现象，也显得逊色了。归根结底，外交政策的形成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是国内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于各国的外交个性，我们可以尝试在此作一简要归纳。

英国，这是一个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都没有受到巨大冲击、也未发生突变的国家。其所面临的世界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面目全非，但其外交的基础——国内政治却变化不大，加之英国国民的思维惯性（保守性的一种表现）及其它原因，英国战后外交中的传统成份比其它国家更为浓厚。英国外交的传统或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政策目标的务实性、手段的灵活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稳健性。务实性——一贯追求自身实际利益；灵活性——根据条件的变化，对外界变通地作出反应；稳健性——不为情感所左右，避免过激的言行和政策大幅度的调整。这些又可归结为现实主义。

战后的英国外交史是一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基调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理想主义这里指的是为自己规划一个宏大的奋斗目标，并较多地受道德原则的支配。概括地讲便是追求大国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英国对自身力量和世界格局的滞后认识不无联系，但它不完全是后者的产物。如果我们考虑到丘吉尔的三环外交的宗旨——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以及这一外交战略统

治了英国外交达20年之久，我们或许可以说理想主义与认识滞后不可分割。英国人对自身认识滞后问题醒悟之后，自70年代初英国将外交重点历史性地移到欧洲，但仍然对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与荣誉如此看重。撒切尔夫人又会在80年代以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为己任，而且英国一直地把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作为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看来理想主义是英国外交中不可忽略的成份。

但另一方面，英国战后外交中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成份又始终占据着主流。这反映在，战后初期英国对外政策中的海洋战略事实上已呈现出收缩之势，其防务重点转移到了欧洲，尽管只是“下意识”的做法，但欧洲化的趋势已初露端倪；其海外义务不断收缩，70年代中期尤为明显；非殖民化进程虽然显得被动，但其殖民体系的解体却相对顺应潮流，且没有给英国国内政治带来巨大的冲击；在欧洲共同体显示出优越性，英国感受到英联邦对其经济意义下降之时，它完成了回到欧洲的历程。

英国外交始终存在着三个稳定的领域，即英联邦政治、英美特殊关系、对欧洲大陆的政策。这三个环节虽然依然存在，但它们的含义和相互关连已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英国外交的现实主义即体现于此。

法国外交与英国外交最明显的不同是法国人素以用激进的方式解决政治矛盾著称，因此法国的外交与英国相比就不那么平衡，而更加富于起伏和戏剧性。此外，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它的立足点和世界观也与英国迥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外交始终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即如何唤醒法兰西民族近于消灭的自豪感，恢复法国在二次大战中失去的大国地位，而同时又能使自己的政策顺应现实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法国也遇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

第四共和国显然来解决这一矛盾。它虽然依靠美国的支持促进了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消除了苏联在安全上的威胁。采取西欧联合的路线为法德捐弃前嫌创造了条件，但这些势力还不足以恢复

法国的大国地位。它试图通过保持殖民大国的地位来恢复心理平衡，但由于这一努力违背了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结果适得其反，非但未能恢复民族自信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

戴高乐从另一个角度来尝试解决这一矛盾。他执行了非殖民化的政策，从而把法国的殖民地从一个沉重的负担转变为法国发挥世界影响的有利条件。他采取了相对疏远美和苏、在共同体内维护法国主权的政策，争取重新建立法国第一流强国的地位。他的我行我素的外交风格恢复了法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信，但它却因忽略了法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

后戴高乐年代的法国外交在致力于维护法国独立地位的同时，纠正了戴高乐外交政策中的某些偏颇之处。法国修补了同美国的关系，在西欧联合中越来越采取现实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法国战后外交中的一个固有的矛盾得到了较适当的处理。正是由于法国人重新获得了充分的自信心，法国才能毫不犹豫地倡导超国家主权的西欧联合，并在联合过程中施加影响，防止在其东部边境上出现一个对法国构成威胁的强大德国。

法国1958年后的总统制所赋予总统的极大权力和政治稳定，使总统个人风格在外交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戴高乐这位在法国国家危难之中上台的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和大权在握而被历史造就为法国战后外交风格的开创者。这也是法国外交的个性之一。

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决定了其外交的特殊性。德国曾是两次大战的策源地，战后它作为战败国被分割占领。冷战造成了德国的分裂，东西德的边界不仅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东西欧的分界线，而且成了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这一独特地位导致其外交政策受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的限制最为明显。尤其是在重新统一问题上。按照现实的逻辑，只有通过缓和和合作才能克服德国的分裂，因此统一以缓和为前提，但是缓和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均势为前提，而均势又以德国的分裂为前提，这就构成

成了一个悖论。难怪在70年代的缓和 high潮中有不少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断言：“德国统一问题已从现实政治领域中被排除。”如果不是由于东欧局势的出人意料的变化和苏联政策的松动，并由此动摇了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根基，单凭西德自身是难以打破这一悖论的，西德也就不可能在90年代起始时看到重新统一的曙光。

西德矢志不渝地追求重新统一的目标，这一政策也是西德恢复大国地位的一种特殊的努力形势。西德通过与英法不同的道路在战后“沦为”二等强国。但就其经济和货币力量来看，早已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个头等强国。但它在政治上遭受限制（西德至今还受到条约的限制不能制造A、B、C武器，即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并且四大国美、英、法、苏仍在法律上对西柏林负有责任），导致其政治地位同经济地位不相称的局面，德国人似乎逆来顺受。（科尔曾说，西德不是托持地球的阿特拉斯神，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等国家，尽管其经济上取得了领先地位，军事上是北约的一个重要伙伴。）但从战后西德的整个外交实践来看，西德恢复政治地位的宿愿却总是在其外交中若隐若现，它常常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换取主权上和政治上的好处。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西德宁愿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来使萨尔重返德国；
（2）加入欧洲共同体最初看来对西德的经济并不一定有利，但为争取在西方盟国中的平等地位，西德却及时下决心加入；（3）一旦它意识到对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便改变了过去的僵硬立场；（4）对于同东德经济交往中的损失从不计较，更不必说在90年代开始的关于重新统一的具体谈判中所作的经济上的让步了。1990年8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国际政治的金钱化现象》文章，认为7月中旬西德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使得戈尔巴乔夫改变立场，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于“金钱掌握着关键”，即西德经常积极地向苏联提供金融援助，这也将是今后德国外交的特点。

意大利，同样是战败国，意大利的战后外交同联邦德国大相径庭。意大利战前就不能称作欧洲强国，更不是世界强国。意大利民族对世界事务的冷漠由来已久，而墨索里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迫意大利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更促使意大利人从世界事务中“退出”。（可能战后初期加斯佩里任总理时期是个例外）。

政府换届频繁，导致意大利外交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但由于天民党始终是执政党，意大利的外交政策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变动。两者相联，又决定了意大利的外交缺乏政治领袖的鲜明个性。

意大利在战后选择了“加入西方”，但它是亲西方的独立主义者，在北约和欧洲共同体内它都不是积极的策划者。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又表明它的外交政策的前提是它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外交事业，只能通过多边机构来实现自己已被确定在最低限度的外交政策目标。

直到80年代，意大利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但是其外交目标仍相当有限。意大利既然长期以来不曾是世界大国，它也就不梦寐以求这一地位。如果说意大利人对自己国家的世界地位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世界事务中尽力发挥自己的有限作用，在地中海地区施展自己的影响，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

除上述说明以外，对全书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本书对各国外交的各个阶段所作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因篇幅有限，为避免赘述，阶段的划分不可能过细。本书参照了一些有关著作，照顾到三个不同方面作出了单一的划分。一是大致年代，如50年代、60年代等；二是不同政府的执政期，如戴高乐政府、密特朗政府等；三是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如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英国自1967年以后开始大规模收缩海外义务和将政策重点转向欧洲。只有意大利是个例外，由于意大利外交的特点，要为其划分阶段是十分困难的，毫无疑问，根据不同的侧重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划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过许多专家的关怀和指点。其中陈乐民、

冉隆勃、周纪荣和徐宗士先生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们获益匪浅。此外，刘惠华同志为英国部分收集了初步资料，周志成同志为英国部分的个别章节作了补充。

如前所述，战后西欧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国内外各种复杂环境的影响，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从1945年到8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而国内关于各国70年代以后外交的中外交著作相当有限，要理清各国的外交脉络，有一定难度。我们的论述虽力求接近实际，但难免有疏漏和观点上的偏颇，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本书的写作分工是：

英国部分：第一章——谭军、第二章——许德音、第三章——周志成、第四章——卢林；

法国部分——陈志敏、霍世涛；

联邦德国部分——周琪；

意大利部分——周琪，吴勇。

全书由周琪统稿改定。

英 国

